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历史智慧与实践探索

——以清代云南布衣学者孙髯翁《金沙江行》《拟盘龙江水利图说》为例

江燕

作为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不仅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更是中国西南边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农业种植、木材转运、滇铜京运的便捷之途。长江素以天堑著称，若无盲风怪雨，则一苇可航天下之险，“独金沙一江，亘古不通舟楫焉。”

清初，国势强盛，数议开凿金江，以达四利：“欲息东西两路之肩，拟滇云百蛮之背，通诸夷梯航之道，会三省联络之防。”乾隆时期绘制的《金沙江全图》，采用中国古代地图传统的山水画画法加地形地貌形象画法，详细地绘制了金沙江两岸各府州县的地理位置和属地，以及运铜各口岸、陆路、水路、纤道、铜厂等分布位置。所绘区域：云南与四川分界线——金沙江段，即西起云南省东川府境内汤丹厂，东达四川省叙州府之新开滩，全长约650公里。这部“金沙江疏治工程图”，堪称中国历代江河治理图之最，为研究金沙江航道工程史的珍贵画卷。它不仅是 中国官绘古地图、山水画地图的代表作，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艺术、史料性具存的古代地图，实为研究金沙江航道工程史的珍贵画卷。2006年6月3日该图出现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最终以280万元落槌，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

金沙江水利航运的开凿，从《金沙江全图》中展示了国家层面主导、边疆大吏屡疏清议、沿途地方民夷合力，共同开凿疏通大境外，作为金沙江上游所经府县最多、影响最大的云南，在清雍正、乾隆间，也是开辟金沙江、兴修水利工程的重要转折点。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作者，他不仅以诗文见长，更是一位因昆明城水患频发，民受其苦，而较早提出“引金济滇”设想的学者。他曾溯流而上考察金沙江，赋诗《金沙江行》，记述清代驻滇各任官吏开凿金沙江之

功绩。又著《拟盘龙江水利图说》一书，对疏通省城昆明六河水利工程，根治水患诸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孙髯（1685—1774），昆明人，字髯翁，号颐庵，晚年自号蛟台老人。自幼喜习诗文，博学多识，以“傲然不群”闻名滇中，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当时师范仰慕孙髯翁，生前曾两次拜访，诗情交好。本文拟就孙髯翁的一首诗《金沙江行》、一部书《拟盘龙江水利图说》，重述明清开发金沙江的重要战略需求和艰难困难。

金沙江行

孙髯翁

乾隆天子神高王，卑躬菲食垂衣裳。川泽沟洫无壅塞，金沙首议开南荒。谁其议者西林相，伟略奇才天下望。乘槎有客到银河，解纆何难穿翠峰。帝曰辅臣慎为之，务使江流永无恙。上公衡命出三台，大开制府谕群材。韩侯鼓舟锐而往，三月果至西川回。按图索形如指掌，高者过山低过滩。西出犁牛东马湖，孙视瞿塘儿汉广。碧烟夹岸树连墟，赤日逐波金洗流。虎豹磨牙伺客过，鼉鼉吹浪窥人往。天险常澄莽草间，月明空抱扬舲想。安奢构掌浪道绝，曾少偏师扼其吭。当时蚤从参议议，岂使长蛇吞巨象。国家车书大一统，王道平路路荡荡。形势从来须接引，治水尤先于路堵。那有土酋复梗化，况是梁山敢倔强。誓将金锁锁支祁，不用丹书驱魍魉。上公奏帝帝曰俞，敕东陈陆诸臣俱。遍集篙师供指画，不惜国帑勤咨告。广宁少保董盛事，轮蹄杂遝江之隅。开江定议度中始，盘古操铎渚沌居。八十三潭潭水清，亿千万年老蛟徙。苟求其故功易奏，行所无事平如砥。万事有成必有创，庸人往往惑于是。

岂少旁挠中怯者，惟在精思独断开。山川开辟各有时，鬼神呵护焉能私。滇铜蜀米互交易，我皇神圣天为之。

作者在诗中开篇将乾隆皇帝比喻为当代大禹，首议开凿金沙江。接着盛赞云贵总督鄂尔泰治疆功绩，尤其对云南水利建设，贡献突出。接着又介绍云南巡抚张允随通力协作，广咨众议；沿线官员，各领其命，各司其职。众臣悉数次往返，或查勘，或试修，旋复旋停，开浚之功，可圈可点。强调疏通金沙江，天堑变通途，一方面可有效平息因交通阻隔造成的明清初“奢安之乱”带给川、滇、黔的纷乱战火和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尽早开辟山川，实现滇铜蜀米互相交易，可避免历朝历代边夷土司以金沙江为凭险，造成频繁动荡割据分裂的局面，最终达到“国家车书大一统，王道平路路荡荡”的盛世太平。

元朝在云南正式建立行省，省会昆明城初具规模，膏腴数十万顷，皆藉滇池六河之水，以资灌溉。滇池方圆三百里，源广末狭，有似倒流，故曰滇。汉武帝欲伐滇国，于长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但因地势北高南低，河带泥沙，若无闸坝、修浚诸法，水急则一泻无存，水缓则沙停可虑。故历史上滇池水患频仍，虽经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修建松花坝水闸，分盘龙江水入金汁河，但水患并未杜绝，元明间多次暴发大水。明弘治时，巡抚陈金自螺夹滩至青鱼滩，修浚二十余里，通畅河流，定有大修、岁修之例。清初，昆明六河年久失修，泥沙石块淤塞填河，稍遇大雨，上游河水无所宣泄，就泛滥成灾，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江坏新城”。雍正八年（1730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思江水为患，示令出力凿之，“于是壅疏流畅，故十余年来，得以

无虞者，皆鄂公之赐也”。

孙髯翁深感盘龙江水患对滇池地区造成的危害，思先贤修水利之功绩，于是“穷岁月之跋涉”，对滇池正源盘龙江源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并“闲披《禹贡》《秦经》《酈注》之书”，参阅有关历史地理资料，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撰成《拟盘龙江水利图说》（下简称《图说》）一卷一册，为滇池流域水利开发利用之重要文献。该书指出滇池水患频仍的原因，是由于江势北高南下，每骤雨而水便发，若遇积雨，立见沸腾，甚至水入人家，坏垣破壁。建议疏浚小东门以下约七里的江道，一律“深凿三尺为则”，并“勒石五载一疏为例”，最后，孙髯翁提出治理盘龙江的五点建议，乃古人顺水性，因其势利导之意：

一“疏壅畅流”。孙髯翁认为“水壅因河浅，不畅流缘尾塞”。建议自小东门起，环明远桥与城河会处，约六七里，大集民夫，各分村落，别里标号，负锄荷箕，踊跃出力，深凿三尺为则。对金、太、杨三河，则宜飭令开宽一丈，深四五尺，令可通舟，往来无碍。对完不成任务或不符合规定者予以处分，并建立岁修制度，务令上下宣通，畅流无碍。

二“分势防溢（溢）”。孙髯翁认为“坎水刚中而柔外，离火内柔而外刚，故火分则炎熒而势更烈，水分则柔减而刚亦衰。故河水惟中流为最急，两岸上下较力为缓焉”。建议在要害地段用分水势之法，因地势，或五里十里，或里许，或数武，开涵洞，造泻水闸，上分河势，下济阡陌，使“环城一水，七脉分流”，可有效防止洪波爆发，九十九泉齐涌奔流，泻入滇池的难容之害。

三“闭引水为客”。昔人曾开一臭水河，位于南关桂香桥外数武东岸，又号龙须河，即堕直闸河。东注香海庵东寺

塔，南回而北注，过通济桥，又北过珠市桥，与城河会约里余。最初开河以为分江之计，孰不知江水与城池两相觝敌，水盛时往往壅而溢岸，乾隆十三年（1748年）昆明大水，倾屋最多，不下数千户，乡人患之，以石闭其上流，而留其尾以泻蓄水，然滇池水盛时，逆流满溢，其害依旧。孙髯翁建议坚决制止盲目堵坝蓄水，注意防止堤坝倾倒淤塞，挖通龙须河及兰花沟等河道，使其遇积雨而不致酿成大患。

四“改一水锁群流”。昆明六河，除海源河外，其余河皆西南注而入滇池。盘龙江一河居北，宝象在南，一北一南，中间不过一里，其余四河又攒集于内。龙江之尾，复东南而兜之如盘龙，“江强河弱，小不敌大，遇水大时，锁而不泄，塞没人稼，害至二十余里”。孙髯翁建议查明昆明六河形势，自西北方相其可开处，开宽江道，彻底根治盘龙江，使江水“既不锁而复不壅，且有环城之势”，盘龙江壅阻解除，其它河水壅阻亦随之消减。

五“因时得所”。不因时，功可成而怨必多；不得所，河虽导而贻流弊。孙髯翁认为兴工宜水涸，民力宜农隙，导引宜得地。自“十一月至花朝，水涸之时也。十一月至花朝，农隙之时也。”在此期间，兴修水利，既不“伤农”，又能提高功效。反映出孙氏关注民生、体察民情的博爱精神；尊重自然规律，因势得所的科学观，及慎思敏锐的行事风格。

该《图说》对了解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利设施，昆明古城池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今天研究长江上流金沙江流域，尤其是滇池建立排灌系统，防旱排涝，进行综合性开发利用，提供了借鉴参考。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抗战期间飘扬在云岭大地上的“救国之声”

陈浩 任传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西南边陲云南骤然成为关中国运的大后方与文化重镇，伴随高校内迁、文人汇聚，沉寂的云岭大地上，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抗日救亡的呐喊以音乐为媒响彻云霄。这些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歌咏团队，以歌声唤醒民众、鼓舞士气，成为了抗战时期云南独特而又强大的精神力量。

“民众歌咏是民族解放的军号，号声在那里，民族解放的斗士也在哪里；民族解放的火把是民众歌咏，火把在那里，民族解放的集团也在哪里。我们要用这军号吹醒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而斗争；我们要用这火把照遍穷乡僻壤，使每一个角落里的同胞们都认清现在我们该做的是：争取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大道……”

这是1937年9月由民众教育馆编选发行的民众歌咏歌本《民众呼声》中的一段话。在这个歌本封面除书名、出版单位外，还有醒目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一句铿锵有力的歌词。歌本编选的第一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有《认清敌人》《解放的钟声》《救亡进行曲》《抗战进行曲》《中国人民联合起来》等20余首歌，每一首歌曲都配有简谱。

诞生在抗战烽火时期的云南歌咏团队

云南近代革命史的斗争，造就了云南各民族有的爱国光荣的革命传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政府对日军侵略采取不抵抗抗日，东三省很快沦陷，进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云南各族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学生演讲，商人罢市，报刊发表抗日报道、时评。同年9月28日，全市“闭市一天，志哀国耻”。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全省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封锁！一致誓死抗日！全省民众武装起来！对日宣战！……”声震天地，不绝于耳”。同年10月3日，又在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路教导团（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大操场内，召开反日民众大会，这是“昆明前所未有的盛会，参加人数近3万人，除工人、学生踊跃参加外，有郊区农民6000人初次参加游行，民族工商业家也有大部分在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发动下参加了这次大会，部分商店停业一天，参加游行”。“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抗日救国会”“学生义勇军”“童子义勇军”“云南邮工

抗日救国五人团”“青年掩护敢死团”“抗日铁血锄奸团”“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各种民间抗日团队组织相继成立。在云南，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之“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基础，1937年8月成立了“云南学生抗敌委员会”，“学协会”通过演讲、歌咏、演街头戏等形式宣传全面抗战。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李家鼎等人组织了“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兴办歌咏干部训练班。一些学校、工会、工厂、专县也纷纷成立了歌咏队，救亡歌声传遍全省。

在党的组织领导下的“民众歌咏团”“歌岗合唱团”

为了加强云南抗战力量的组织领导，1935年下半年，已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任职的共产党员费炳与上海的特科党组织取得联系，费炳组织派李浩然到云南会同费炳一起恢复重建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1935年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6月至8月费炳担任书记。1937年5月，北方局领导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指派云南籍党员李群杰回滇恢复重建云南党组织，7月建立了中共昆明支部。省临委与昆明支部虽无组织联系，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积极配合协作领导云南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在地下党员赵国徽、唐登岷、李家鼎（同生）、张锐等同志的组织下，通过民众教育馆成立了民众歌咏团，教唱聂耳、冼星海等人创作的歌曲，同时利用广播电台传播救亡的声音，吸收爱国救亡的积极分子参加，同时在民众教育馆以歌咏运动作为开展党的工作的有力武器。民众歌咏团活动由“学协会”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青年工人、店员和各中小学音乐教师参加，同时从上海、日本等地回昆明的音乐专家林志音、王浩兰等主动来参加教唱工作。云南大学、云大附中、昆华师范、昆华工校、昆华中学、昆华女中等大中学校都组织了歌咏队，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又帮助昆明纺纱厂、大道生织布厂、开智印刷厂、火柴厂、邮电工会、缝纫工会等工厂和职工团体组织了歌咏队。以“民众歌咏团”为中心，各学校、工厂相继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工作阵地逐渐扩大，各学校还会在节假日到近郊农村进行活动。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十分重视歌咏工作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中的作用。在省工委书记马子卿直接领导下，由李家鼎、张锐、董藩组成“歌运工作党小组”负责领导这项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众多歌咏团队。这些歌咏团队在接受思想洗礼后，《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在学校和工厂中广泛传播，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

1940年在“歌咏党组”的领导下，在昆华民教馆举办了第三期歌咏干训班，以留在昆明的学员为基础，连同“民众歌咏团”组成了“歌岗合唱团”。“歌岗合唱团”的全称是“云南全省歌咏协会歌岗合唱团”，云南全省的歌咏团、唱歌队都归歌咏协会联系管理，但实际是在“歌咏党组”领导下，李家鼎、张锐、李仁荪、徐守廉、林志音、王旦东等中共党员、进步人士都入选“歌岗”领导班子。为深入推广歌咏抗战救亡运动，云南歌咏协会于1940年5月10日编辑创刊出版了《歌咏岗位》月刊，其中月刊主编李家鼎、张锐两名同志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遵照组织指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工作方针，在办刊上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社会力量和社会人士共同努力，时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宣传科长张友仁在《歌咏岗位》创刊号中对《歌咏》的时代任务做了鲜明的阐述：“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建设建国事业中，歌咏运动是一种时代宣传武器，它可以发扬民族精神，激励民族意志，在救亡工作的领域里固守着重要岗位，执行唤起民众，动员民众的时代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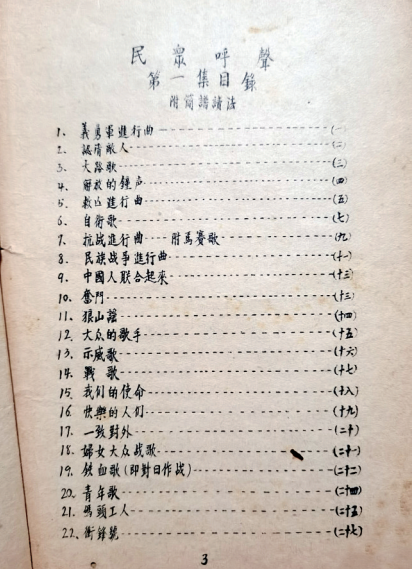
“皖南事变”后，“歌岗合唱团”的团员们不能继续在省党部内练习唱歌，根据上级党组织“隐蔽精干”的指示，在“歌岗”领导李李家鼎、张锐先后离开后，便由李仁荪、徐守廉、董源等负责团结更多的同志坚持下来。1943年“歌岗合唱团”改名为“昆明合唱团”，又在机关、学校、工厂扩大或组织更多的歌咏团队，在这期间，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另一个文艺组织“新音乐社昆明分社”也为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出版了《新音乐》（昆明版）月刊。

凝聚时代的救国之声

在党组织领导下，以大中学校师生为主体，由工人、市民等人员组成的云



南歌咏团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通过大型集会活动、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配合“学抗会”开展抗日宣传，组织万人大会唱，在云南广播电台设立歌咏节目，定期组织演播，举办慰劳抗日将士募捐运动。1937年10月举办欢迎“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北上抗日大会；1938年春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全市民众群众植树运动大会；1938年举行“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大会（创作并教唱纪念歌曲）。1938年7月举办欢迎“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军”北上抗日大会、纪念“九一八”示威大游行、9月保卫武汉大游行，同年冬欢迎“华侨运输队归国参战”大会。歌咏活动以生动传唱的方式，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全民抗战号召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的团结抗战原则深入人心，这些歌曲不仅艺术化地传达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核心理念，更通过朗朗上口的旋律和通俗易懂的歌词形式，使党的政策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1938年9月28日，日机轰炸昆明后，各中学疏散到呈贡、晋宁、昆阳、路南等县，由各学校歌咏队在各县城和农村开展歌咏活动；各校毕业到外地就业或假期回乡的参加过歌咏工作的学生，在晋宁、建水、蒙自、个



作者供图

旧、罗平、昭通、宜良、凤仪、大姚、镇南、楚雄等多县开展歌咏活动，随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就比较广泛地带动起来了，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歌咏团队以歌声为武器，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鼓舞了士气，广泛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他们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宣扬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线，让党的团结教育革命青年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些团队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载体，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昆明市博物馆（昆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镌刻在时光里的历史文化印记

唐伟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是一条极具历史情怀的大通道，是“中国—缅甸—印度洋国家贸易和物流新通道”的简称，以我国内陆地区为起点，途经云南省，从中缅陆路边境口岸出境，通过海公铁联运的方式，联通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贸易和物流大通道，是云南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骨干路线之一，不仅具有重大的当代经济战略价值，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循千年山路辙痕，铺展时光通途之卷。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贸易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时期。汉武帝为打通通往印度的道路，积极探索西南方向的贸易路线，由此开启了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那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精美物产，在马帮清脆的铃铛声中，沿着崎岖山路，经缅甸，向着遥远的印度洋彼岸进发。这些货物不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传播者。丝绸的轻柔绚丽，展示着中国古代高超的纺织技艺；茶叶的芬芳，带去了东方独特的生活情趣；瓷器的精致典雅，让世界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审美韵味。在这条古老的通道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汇聚，共同谱写着贸易的传奇。在唐代，南诏国与缅甸、印度等地贸易频繁，南诏的麝香、毡布等特产深受周边国家欢迎。宋代，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更加繁荣，缅甸作为连接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重要中转站，其贸易地位日益凸显。近现代以来，中缅边境贸易持续活跃。中国的纺织品、日用品、机械设备等商品通过缅甸进入印度洋沿岸国家市场，缅甸的木材、矿产、农产品等资源以及特色手工艺品也大量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缅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方式日益多样化。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兴起，还促进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当多元文明相遇，开启融合璀璨之光。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区域合作与互联互通不断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它不仅是一条承载货物运输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跨越国界、连接不同文明的文化长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缅甸及印度洋沿岸其他国家的多元文明在此相遇，碰撞出绚丽的火花，融合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对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从印度经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等地，形成了独特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带。同时，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也在通道沿线地区有一定传播，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相互尊重、交流，共同构成了文化多元共生的局面。

承历代开拓之脉，擘画时代蓝图之梦。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鼓励民间商人参与交通建设，修建了许多通往缅甸的道路和驿站。这些道路和驿站不仅是官方传递信息、调遣军队的通道，也为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海上贸易日益频繁，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贸易通道相互补充的格局。在孟定清水河口口岸到缅甸仰光约1138公里，以昆腕线（国道320线）从昆明经畹町到仰光为例，公路里程全长1955公里。假设从昆明出发走孟定到仰光，相比走昆腕线到仰光，可节省约817公里。1938年，这一构想开始实施，在技术手段落后、投资严重不足、施工条件极其艰苦的背景下，靠着人口绘制施工图、人背马驮施工材料，用铁锹、锄头进行施工，用3年多（1938年冬—1942年春）时间完成了滇缅铁路工程总量的60%，到1942年，因抗日战争战事格局变化而炸毁了已建成的设施，至今在云南临沧罗罗河、南汀河沿线仍保留着部分铁路遗址。时光流转，进入新时代，中缅印度洋新通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这条通道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内涵。目前，云南已建成5条出境铁路通道，推动了西南地区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将成为连接亚洲与非洲、欧洲的重要交通枢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临沧市委党校决策资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